

# 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

谢元鲁

**内容提要** 中国商业史上著名的山西商人集团崛起于明清,衰落于民国。兴衰的原因,与这一历史时期的北方边境地区,出现了由秦汉以来的战争格局转向和平格局的历史性变化,从而导致内地与蒙古地区的贸易繁荣关系甚巨。同时,也与清代至民国中俄贸易关系的变迁,以及随着近代铁路和轮船交通的兴起,北方边境贸易重心出现地理位置的转移有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 明清 对外贸易 山西商人 蒙古 俄罗斯

明清山西商人的兴起,是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现象,当时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sup>[1]</sup>为什么山西商人会在这一历史时期崛起,以雄厚的财力称雄一时?从全国范围来说,当时资本富厚的商人集团,还有徽州商人、陕西商人、闽粤商人、宁波商人等。为什么明清时期会在中国的西北和东南地区出现影响全国的商人集团,而其它地区则没有形成这样的集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山西明清以前的民俗来看,商业气氛十分淡薄。《隋书·地理志》说,山西南部的上党、西河、临汾、绛郡一带,“人多殷阜,然不甚机巧。”这种不以机巧谋生的民俗,是自然经济的产物。这一情形到宋代迄未改变,宋代的山西地区,“当太行之险地,有盐铁之饶。其俗刚悍而朴直,勤农织之事业,寡桑柘而富麻苧。善治生,多藏蓄,其靳蓄尤甚。”<sup>[2]</sup>仍然没有商业发达的征象。似乎在明代以前,山西人的勤于农桑耕积,生活俭朴,刚强好武,成为相沿一千多年的风俗。

但是到明清时期,随着晋商的兴起,山西民俗也一变而为背本逐末。明代张瀚说,当时山西“平阳为富饶,大同、潞安,倚边寒薄,地狭人稠,俗尚勤俭,然多玩好事末。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sup>[3]</sup>关于明清山西商人兴起的原因,当时人大多归结于地少人多的后果。清人康基田说:“太原以南多服贾远方,或数年不归,非自有余而逐什一也,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sup>[4]</sup>同样有人认为,“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耕也。”<sup>[5]</sup>这些议论都把晋商兴起的原因归结于人口压力的增加,引起农村过剩人口进入商业流通领域谋生。但是,人口压力的增加固然是晋商兴盛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仅以明代万历年间而言,全国各省中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 30 人的有北直隶、南直隶、浙江、江西、山东、山西、河南七个省,而北直隶、江西、河南等省就并不以经商闻名。<sup>[6]</sup>可见,在明清时期除人口增加外,山西地区出现了异于明清以前的重大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给山西带来了历史

的机遇,导致了晋商的兴起。

## 二

明清时期山西经济环境的重要变化,主要就是中国北方边境的贸易格局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历史上,汉唐时期开辟兴盛的著名中外交通商贸路线——丝绸之路,使关中、陇右一带在一千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商业外贸区域。但由于丝绸之路偏西,对山西地区商业未能产生重要影响。唐代安史之乱以后,西北诸少数民族政权,如吐蕃、西夏、西辽、金、蒙古等相继兴起,使传统的中外陆上交通路线受到阻塞。因此,不仅关中陇右,而且整个西北地区包括山西在内的商业,都趋于衰落。

但是,进入明清时期以后,这一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变化首先始于明代蒙古草原南部的逐渐开发,明代中后期与北方蒙古鞑靼较长时期基本保持和平状态以及开展互市贸易。

从明代中期开始,为防备蒙古的侵扰,建立了以长城为主体的九边防御体系。它不仅有效地阻遏了蒙古的侵扰,使北方边境地区出现较长时期的相对安宁状态,而且明王朝驻军的供应需要本身就刺激了商业的发展。仅以山西西北部九边之一的偏关而言,“迨有明中叶,益兵增将络绎于道,营帐星罗棋布,餉用既饶,市易繁盛,商贾因贲致富者甚多,起居服物竞尚华靡,习尚为之一变。”<sup>[7]</sup>这种安定和平的状态,反过来又促进了蒙古草原南部的开发。嘉靖时,在蒙古丰州(今呼和浩特市)一地就居住有汉族人口数万人,他们主要从事农耕,靠近边境一带的蒙古人也大都学会了农耕,开始过定居生活。“近疆水陆屯田,悉垦如内地。”<sup>[8]</sup>蒙古草原南部经济的发展与汉蒙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为商业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到明代中后期,蒙古与山西地区的商业交往已十分频繁。早在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就在大同设立马市,“巡抚卢睿请令军民平价市驼马,达官指挥李原等通译语。”<sup>[9]</sup>后虽因也先入侵和土木之变发生,互市一度中断,但到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又再次恢复。明代山西马市的不断罢兴,说明当时北方边境的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开始互相依存,茶马贸易已经把山西与蒙古的经济联结为一个统一的市场。山西朔平府(今山西右玉县)在“明初没卫,为云西要路,兵道协镇,驻防于斯,粮餉商旅,多所经过,城关相接,室庐相望,颇称富庶。”<sup>[10]</sup>而大同杀虎堡“为云中第一冲要地,虏自献琛以来,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sup>[11]</sup>山西商人还把山西、河北等地出产的布匹、丝绸等运销蒙古地区,如直隶正定府的布匹和潞州的绸缎。

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年),明王朝与蒙古俺答汗达成“封贡通市”的和议。这一历史性事件,不仅是明代后期北方边境得到安定发展的条件,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又是中国北方边境局势由秦汉以来的以战争为主导转向以和平为主导的历史转折点。应该说,山西商人是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的。他们把北方边境贸易,迅速由蒙汉交界区域扩展到蒙古内地。据统计,自隆庆五年(1571年)至明末的六十余年间,蒙古马市的成交马匹约有三百万匹左右,每匹按当时中等价格白银十两计算,价值三千万两白银之多。<sup>[12]</sup>可见这一历史时期北方边境贸易的规模之大。而这种贸易中的民间贸易部分,主要即由山西商人所占据。到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俺答汗在古丰州地区修建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城)后,蒙古地区的呼和浩特,归绥与河北境内的宣府(今河北宣化县)等地,很快发展成为蒙古地区与山西、河北等地进行边境贸易的重要商业城市。如归绥在明代“为蒙

人游牧地，谳达内附后，始有晋人来营商业，初仅百物互易，后始代以货币。……票号有平遥帮、祁县帮之分，专营汇兑。”<sup>[13]</sup>而明代的宣府，“直隶、河南、山东西之刍粟，皆输于此，西淮、长芦、河东诸盐商，皆业于此。”<sup>[14]</sup>成为山西商人的对蒙古贸易中心之一。

### 三

进入清代，内地与蒙古的关系又发生重大变化。还在满族入主中原以前，漠南蒙古各部就已归附清朝。清统治者赐给蒙古王公贵族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显贵的封号，并与他们世代保持婚姻关系，内地与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在这种情形下，山西与蒙古的商业贸易更为活跃。不过，对于清代山西商人继续兴盛的因素而言，首先还是清康熙、乾隆时为平定蒙古准噶尔部进行的长期战争。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乌兰布通之战起，清廷大军北征西讨，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平定准噶尔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平定天山南路回部，长期的战争使大批山西商人成为军队后勤供应的重要支柱，许多商人因此而起家。他们甘冒危险，不畏艰难，追随军队远征蒙古草原和天山南北路的戈壁沙漠之中，赢得丰厚利润。清人纳兰常安说，当时“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以其沿边居处，素习土著故也。其在筑城驻兵处建室集资，行营进剿，时亦尾随前进，虽锋刃旁午，人马沸腾之机，未肯裹足，轻生而重利，其情乎。当大军之集，斗米白镪十两，酒面果蔬，虽少售亦需数金，一收十利，意犹未足，是以收利盈千万亿，致富不赏。”<sup>[15]</sup>清政府准许民间商人在为军队运米的同时，携带其他货物前往交易。乾隆二十年(1755年)下诏规定，“茶叶布匹，官兵蒙古日用所需，乘便带售，与蒙古有益，在商贾得利。……由归化城运米往军营，无庸禁止私带茶布，酌量驼载转往。”<sup>[16]</sup>这就为民间商人随军贸易提供了官方的保护。山西祁县乔氏商人集团的“复盛公”商号，发迹于包头，正是因为清代乾隆初年，为了供应驻防军队的粮秣，当地官府把土默特旗的广大牧场大量开垦耕种，农业逐渐发展，由内地来到口外种地和经商的人日益增多。包头成为蒙汉贸易的又一个中心。复盛公最初就是从包头开设草料铺，经营豆腐制品，日用杂货供应当地蒙汉居民开始发家，在此后二百多年间发展成为包头地区首屈一指的钱庄和当铺。<sup>[17]</sup>

另一家著名的清代北方边境地区最大边贸商行，山西太谷“大盛魁”的兴起也是如此。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山西太谷县的三个穷苦农民，随着康熙征剿噶尔丹的部队进入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多，做肩挑小贩，供应军队的日用杂货。在噶尔丹叛乱被平定后，清军营地移驻大青山后的武川，他们又在山西的杀虎口开设商号供应军需，因之致富而兴起，以后在蒙古科布多设立总号，专营对蒙古和俄国的边境贸易<sup>[18]</sup>。清初山西介休商人范毓蕃，在“康熙辛丑壬寅间，西征准噶尔丹，道远，粮运石费二十金，不多能继，公私苦之。毓蕃与弟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克期必至，省国费以亿万计。将帅上其功，赐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sup>[19]</sup>范氏商人集团以较高的效率和较省的运费，保证西征大军的后勤供应，得到清政府奖赏官职，也由此奠定发家基础。

蒙古准噶尔部叛乱在乾隆时期最后平定后，山西商人并未失势，相反，利用蒙古地区的安定局面和与内地经济联系加强，积极开展对蒙贸易，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外蒙首府库伦，成为清代中后期山西商人会聚中心，在“康熙年间，有山西商人来此经商，共有十二家，当时商会之组织，即为二十家各举一商董，称为二甲首。”<sup>[21]</sup>据当时人统计，在清代后期贸易最为繁盛时，在库伦的

西库东营两区,山西商人就有一千六百三十四人之多,主要经营大宗批发营业。<sup>[22]</sup>大盛魁、天义德、元盛德在清代后期,被称为山西对蒙贸易的三大商号,即以库伦为基地。在山西商人中,这样的事例还很多,如介休的侯氏家族创办的蔚字号绸缎行,始于清康熙年间,最初贩卖苏杭一带生产的绸缎,到山西、内蒙等地,因此获得巨额利润,以后在道光初年改为票号,经营金融汇兑业务。<sup>[23]</sup>作为清代经营北疆和外蒙基地的巴里坤(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城厢内外,烟户铺面,比节而居,商贾毕集,晋民尤多。”<sup>[24]</sup>可见山西商人的兴盛与清代北方边境汉蒙贸易的关系何等密切。

#### 四

除了蒙古与内地的贸易外,清代中俄关系的变迁,对山西商人的兴盛同样起了极为重要的刺激作用。从十六世纪后期开始,俄国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在十七世纪前期开始与中国发生直接接触。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在中俄经过雅克萨之战后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已规定,中俄两国人民可以过界来往,开展互市,这就打开了中俄边境贸易的大门。1728年(清雍正六年),中俄双方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规定在中俄边境的尼布楚、恰克图等地通商互市。条约签订后北方边境地区的安定与和平,为山西商人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对外贸易途径。山西清初著名商人介休范氏家族,“市易边城以信义著,国朝定鼎初,召至京师授以职,力辞,因主贸易事,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岁输皮币入内府。……晓畅边地阨塞险易,蒙古诸部长往往知府君名。”<sup>[25]</sup>范氏家族的兴起,与清代前期与蒙古和俄国关系甚大。

从全国范围来看,清代对外贸易在鸦片战争前出现了奇特的现象:东南沿海地区是宋代以来的中外贸易发达地区,但在鸦片战争前却只有广州一口开放通商。相反,在西北漫长的中俄边境线上,清政府却并不限制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全国对外贸易格局形成东南封闭而西北相对开放的局面。清代中俄贸易口岸恰克图,“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初立时商民俗尚俭朴,故多获利。”<sup>[26]</sup>

俄罗斯需要的中国商品,如茶叶、布匹、烟叶、丝绸等,是山西商人运销俄国的大宗。在中俄恰克图通商后,山西商人前往蒙古及俄国经商的更多。清代山西商人每年运往蒙古库伦、科布多、恰克图等地,专门和俄国商人交易的砖茶就有约四十余万箱,折合三千二百四十万斤茶叶。在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年)间,仅在恰克图一地的市场中,中国对俄茶叶输出每年平均达800余万俄磅,价值800万卢布,当时约折合白银320万两之多,而俄国同期每年由恰克图向中国的商品输出仅600—700万卢布。中国由此获得大量以白银支付的贸易盈余。<sup>[27]</sup>如清代北方最大的民间外贸商行一大盛魁,即由山西太谷商人组成。大盛魁在清代乾隆以后的全盛时期,“有职工六七千人,骆驼商队有骆驼一万六千到二万头,业务重心在内外蒙古,活动地区包括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以及内蒙古各盟旗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其资本周转额,仅在外蒙古即达一千万两白银以上。”<sup>[28]</sup>这样庞大的外贸商业机构和雄厚的资产,比之当时著名的广东十三行洋商也毫不逊色。大盛魁依靠雄厚的资金,灵活的经营,过硬的商品质量与周到的服务,长期保持了对蒙古、俄国的边贸垄断地位。把中国出产的茶叶、烟丝、绸缎、布匹、

糖酒、银器运往蒙古和俄国，又把牛马、皮张、药材和毕叽、毛呢等出产运回中国销售。另一个著名的经营蒙古、俄罗斯贸易的山西商人集团，是太谷的曹氏家族。其所开设的彩霞蔚、锦泰亨等商号，主要经营丝织品贸易。他们从河南鲁山采购回柞蚕丝所织的曲绸，“另行打包，粘贴上曹家字号，然后用驮骡运往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莫斯科等地销售。每年约可运销一万二千匹，价值白银三十六万余两。当时作此项生意的商号有一二十家，而锦泰亨为其中资本最雄厚的一家。回头货则运俄国的金沙、呢绒、哈喇、毛毯等物，行销内地。”<sup>[29]</sup>

除了运销全国各地的产品外，晋商也把山西省的特产作为边贸的重要商品。其中最著名者为潞绸和烟叶。早在明代，山西潞绸就十分有名，其产品除进贡宫廷及供应国内市场外，有相当一部分进入边境互市，“舟车辐辏者转输于省直，流衍于外夷，号称利藪。”<sup>[30]</sup>清代山西烟叶的主产地在曲沃，最高年产量达一千四百万斤，烟叶质量上乘，加工精细，年产烟丝四千至五千吨，尤其东谦亨商号制作的“东生烟”，畅销于蒙古的库伦、恰克图和俄国的西伯利亚及莫斯科等地，在中外享有盛名。<sup>[31]</sup>正因为清代山西商人以蒙古、俄罗斯为重要经营范围，所以培养出一大批蒙古通与俄国通，许多商号的经理伙计，“其在蒙古者通蒙古语，满洲者通满语，在俄边者通俄语。每日昏暮，伙友皆人手一编，习语言文字，村塾生徒无其勤也。”<sup>[32]</sup>

## 五

如果说明清时期内地与蒙古，中国与俄国的边境贸易发展，促进了山西商人的兴盛，那么在清代末年民国初年，北方边境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山西商人的衰落同样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清代末年，随着俄国侵略势力的深入，俄国商人凭借不平等条约的规定，逐步取得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商业特权，对晋商渐处于优势地位。咸丰十年（1860年）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后，俄国取得在蒙古边境通商，并在边境交界地区免税贸易的权利。同治元年（1862年）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又进一步规定俄国商人在天津口岸可以享受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的优惠。同治五年（1866年），俄国又取得在天津海关免征茶叶半税的特权。这样，俄国商人货物得以用较低价格倾销，从中国进口砖茶等商品，亦可直接以较低价格在汉口等产地进行收购。但山西商人则仍需按清政府规定交纳沉重的厘金税收，在贸易成本上处于劣势。在1877—1884年间，汉口因茶叶经营亏本而倒闭的山西货行，就达十余家之多。<sup>[33]</sup>仅从1865年到1867年，俄商直接在中国内地贩茶的数量，由164万余磅增加到866万余磅，恰克图的晋商商号却由原来的120家下降到4家。<sup>[34]</sup>咸丰十一年（1861年），俄商才在库伦建立第一个商行，当年俄国对蒙古贸易额不到22万卢布，但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已剧增到1700万卢布，贸易额增加了近八十倍。<sup>[35]</sup>山西商人在这种不利形势下，经营日益萎缩。

同时，从二十世纪初年起，中国北方边境的贸易交通路线发生巨大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是近代铁路及海运交通的兴起带来的。1903年，由赤塔经满州里、哈尔滨到海参崴的中东铁路通车；1908年，由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通车。这些铁路的通车，使俄国对华贸易的重心，由内外蒙古转移到中国东北地区，中东铁路通车当年，货运量即达33万吨，约为中俄通过恰克图市场贸易货运量的50倍。铁路较廉的运价和较高的运输效率，对商品流向产生巨大吸引力，如原来由湖北汉口通过山西大同和张家口北运俄国的砖茶，转由天津用海轮运到大连，再经中东铁路运至西伯利亚。<sup>[36]</sup>因为俄国商人利用中国国内通商口岸开放的特权和近代交通发展的便利，深入中国内

地直接贸易,恰克图、库伦、张家口等传统边境商贸中心趋于衰落,山西商人作为对俄国和蒙古地区贸易商的中介作用也丧失殆尽。近代铁路和海运交通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内陆地区商品流向沿江或沿海的通商口岸,然后向国外出口,进口商品则沿相反的流向进入内地。在这个历史性的转折中,山西商人丧失了传统的商道和市场,又未能在开辟新商路的竞争中获胜,应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与1921年外蒙古的宣布独立,使中国的北方边境形势骤然改观。中俄、中蒙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出现中断。这种情形,沉重地打击了一大批以经营蒙古和俄罗斯商业为主的山西商号,他们在国外的资产被没收,损失重大,有的丧失传统市场,生意大幅度下降。这样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一批山西商号破产倒闭。当时仅山西榆次常氏商人集团开设的大德玉商号及其联号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等,在莫斯科等地损失的资产即达41万6千卢布,折合白银30万两。<sup>[37]</sup>又如曲沃烟丝的外销,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及外蒙宣布独立后,不能再向蒙古、俄国输出,加以俄钞失去汇兑条件,使曲沃东谦亨等大批烟坊倒闭,烟叶种植面积缩小,烟草产量也随之而下降,曲沃烟业开始衰落。<sup>[38]</sup>

山西最大的对俄蒙贸易商行大盛魁的衰落,也主要是因为1911年外蒙古第一次宣布独立后,蒙俄订立库伦通商协定,俄国取得了在外蒙免税贸易的特权,大盛魁无法与俄国商人竞争,受到第一次重大打击。俄国十月革命后,大盛魁在俄资产全部被没收,大盛魁损失不赀。1921年,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没收中国商人在蒙资产,至此,大盛魁再受打击,负债累累,终于最后破产。<sup>[39]</sup>而太谷曹氏商人家族的衰微,与其下属的锦泰亨、彩霞蔚商号,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因对蒙俄贸易停顿而倒闭,曹氏家族遭受重大损失也有直接联系。仅锦泰亨在对俄贸易中积累的大量旧俄钞票——羌帖,因俄国十月革命后被废弃而遭受的损失,即相当于白银24万两之多。<sup>[40]</sup>所以,从十六到二十世纪初叶的四百余年间,中国内地与蒙古地区以及中国与俄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变迁,既是山西商人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导致山西商人最终衰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 注 释:

[1] 王士性:《广志绎》卷3。

[2] 《宋史》卷86《地理志》。

[3] 张瀚:《松窗梦语》卷4。

[4] 康基田:《晋乘蒐略》卷2。

[5] 光绪《五台新志》卷2. 生计。

[6]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72。

[7] 民国《偏关志》卷上。

[8]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47《张太岳行实》。

[9] 《明史·食货志》。

[10] 雍正《朔平府志》卷3《方輿志·风俗》。

[11] 《明实录》卷558, 万历四十五年六月丙申。

[12] 葛贤慧、张正明:《明清山西商人研究》第43页, 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 1992年版。

[13] 民国《归绥县志·经政志》。

[14] 吕柟:《吕泾野先生文集》卷7《赠秦宣府序》。

[15] 纳兰常安:《行国风土记》。

- [16]《清高宗实录》卷481,乾隆二十四年正月丙申。
- [17]刘静山:《山西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 [18][28][39]孔祥毅:《清代北方最大的通事行一大盛魁》,《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 [19]嘉庆《介休县志》卷9.人物。
- [20][25]汪由敦:《太仆寺卿范府君毓榘墓表》,《碑传集》卷42。
- [21]《内蒙地志》。
- [22]陈策:《蒙事随笔》。
- [23]冀孔瑞:《介休侯百万和蔚字号》,《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 [24]文绶:《陈新疆情形疏》,乾隆三十七年,《皇清奏议》卷59。
- [26]松筠:《绥服纪略》。
- [27]葛贤慧、张正明:《明清山西商人研究》第165页,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
- [29]聂昌麟:《太谷曹家商业资本兴衰记》,《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 [30]顺治《潞安府志》卷1。
- [31][38]段士朴:《曲沃旱烟业简述》,《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 [32]《清稗类钞》第5册,农商类.山西票号。
- [33]黄鉴晖:《山西票号史》第248页,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
- [34]《山西外贸志》。
- [35]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第50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 [36]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5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37]常士晔:《榆次常氏二百年从商纪略》,《文史研究》1992年第1、2期。
- [40]刘建生、陈大鹏:《晋商衰败探因》,《文史研究》1992年第1、2期。

## 学术动态

### 四川省期刊协会成立

3月11日,四川省期刊协会在成都召开了成立大会。360多种期刊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四川是一个期刊大省,其品种、数量在全国均名列前茅,在本省的社会传媒中,期刊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近年来,我省已先后成立了期刊研究会,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科技期刊编研会,高校学报研究会等期刊组织,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活动,为成立全省性的期刊行业组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自1992年9月以来,在全省期刊界同仁的积极促成和参与下,在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四川期刊协会终于成立。协会一致推举省政协主席聂荣贵、省委副书记秦玉琴、省人大副主任康振黄和省政协副主席韩邦彦为顾问,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杜江出任名誉会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陈焕仁担任会长,《四川党的建设》杂志总编辑吕红文任常务副会长。四川省期刊协会将在团结全省期刊界同仁,为繁荣和发展四川的期刊事业,发挥期刊与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强期刊之间和期刊与社会各界的交流,维护会员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四川省委副书记秦玉琴同志,写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省新闻学会、省报协、省版协、省印协、省发行协会、省版权研究会等省内新闻出版系统的兄弟学会、协会和省民政厅、省报刊发行局、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新闻出版局等单位到会祝贺。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期刊协会,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广东、海南、福建、山西、西藏、贵州等地的新闻出版局和期刊协会来电来函表示热烈祝贺。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被选为理事单位,主编朱文显教授被选为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大明)